

两汉讖纬考论

张峰屹

摘要:“讖”与“纬”的思想观念,在两汉时期有一个由分立而化合的过程。古今学人往往笼统讲说汉代“讖纬”,并不符合实际。讖验观念始自远古,至汉末一直存续,从未间断。讖至汉初,伴随着经学兴起而发生了新变——以讖辅经、以讖释经。此一现象肇始于文帝时,至汉末一直存在。东汉明、章之后,以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所形成的《白虎通》为标志,确立经、讖互释为正统思想。而其远源,实在汉初。考察讖、纬之发生演变史,实际上有讖而无纬。东汉后期出现的所谓“纬”,实际就是讖,其实质是以讖“纬”经。历来通行的“讖纬始自哀、平之际”的论断,不仅曲解了张衡,也淆乱了“讖”、“纬”的概念,更与西汉思想发展实际不符。

关键词:汉代;讖纬;讖纬起源;讖纬名实;以讖纬经

引论:张衡《请禁绝图讖疏》的确切涵义

历代学者关于讖纬之起源的论断,姜忠奎《纬史论微》卷一析为“以时代为断者”、“以人物为断者”、“以典籍为断者”三类^①,共罗列了三十种说法;钟肇鹏《讖纬论略》第一章《讖纬的起源和形成》条别为十二种^②。可见其持说纷纭之状。实际上,讖纬起源问题还与对其性质的判断紧密相联,这就更加复杂。

凡古近诸多说法中,张衡给顺帝的上疏(原文载《后汉书·张衡列传》,严可均《全后汉文》题为《请禁绝图讖疏》),因其论说图讖问题较早并且较为系统,最受推重^③。这篇上疏,以下几个意思甚明:

1. “律历(观星辰逆顺,寒燠所由)”、“卜筮(察龟策之占,巫覡之言)”、“九宫”等“立言于前,有征于后”的书,叫做“讖书”;它是“圣人明”、“智者贵”的书。
2. “讖书”起源于秦汉之前,只是当时懂得它的人很少;西汉成、哀之前,“讖书”寢息不闻。
3. 成、哀之后复起的“图讖”,有或不合经、或自相矛盾、或使用材料错谬之处。
4. “《河》、《洛》、《六艺》,篇录已定,后人皮傅,无所容篡”^④,这应该是指汉代讖纬篇目已经在刘秀中元元年(56)确定,并宣布于天下,后人不得傅会、篡改。
5. “且律历、卦候、九宫、风角,数有征效,世莫肯学,而竟称不占之书”云云,联系上文“圣人明审

作者简介:张峰屹,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(天津 300071)。

基金项目: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“东汉文学思想史”(14BZW026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姜忠奎:《纬史论微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5年,第18—37页。

② 钟肇鹏:《讖纬论略》,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1年,第11—21页。

③ 据张震泽考证,此疏作于顺帝永建元年(126)以后,阳嘉二年(133)以前。见张震泽:《张衡诗文集校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,第363页。

④ 李贤注:“衡集《上事》云‘《河》《洛》五九,《六艺》四九’,谓八十一篇也。”与《隋书·经籍志一》所载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七经纬》八十一篇,当是一致的。

律历以定吉凶……立言于前,有征于后,故智者贵焉,谓之讖书”可知,张衡并不是主张禁绝一切“讖书”,而只是要剔除其“后人皮傅”、错谬不经而没有证验的部分(也即所谓“不占之书”)。

6. 张衡把成、哀之后错谬不经的“不占之书”称为“图讖”(或“图”,或“讖”),与先秦时期“圣人明”而“智者贵”、“立言于前,有征于后”的“讖书”,在称呼上似有所区别。因为据他对这两种书的述评看,其褒“讖书”而贬“图讖”之意非常明确。

关于张衡对讖纬的看法,学界有两个基本判断:一是认为张衡说讖纬起源于哀、平之际,二是认为张衡反对讖纬之学。细读张衡的上疏,这两个判断都有理解不周之处。前一点,张衡分明是说:先秦就有“讖书”,至成、哀之后复起,哀、平之际“图讖”大成——而这时的“图讖”已与先秦的“讖书”有所不同,出现了不合经、自相矛盾、错谬等问题。后一点,张衡并非反对一切讖说(如不反《河》、《洛》),而只是主张禁绝“成、哀之后”出现的那些“不占之书”。事实上,他是认可天人感应的讖验思想的。如《后汉书》本传载录他给顺帝上疏陈事即有云:“阴阳未和,灾眚屡见,神明幽远,冥鉴在兹。福仁祸淫,景响而应,因德降休,乘失致咎,天道虽远,吉凶可见。”《后汉纪》卷十八载其顺帝阳嘉二年(133)京师地震对策亦云:“政善则休祥降,政恶则咎征见。……昔成王疑周公,而大风拔树木,开金滕而反风至。天人之应,速于影响。故称《诗》曰:‘无曰高高在上,日监在兹。’间者京都地震,雷电赫怒。夫动静无常,变改正道,则有奔雷土裂之异。”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“(永兴二年六月)彭城泗水增长逆流”李贤注引张衡对策曰:“水者,五行之首。逆流者,人君之恩不能下及,而致逆也。”这便从思想上决定了张衡不会全面反对讖说。何况,无论从当时人们的知识背景来说,还是从讖纬作为东汉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而言,再进步的思想家(包括桓谭、王充等)都未能主张完全剔除讖纬之学。

张衡的上疏,讲得既明白又含混。其明白之点已如上述;其含混之处在于:第一,他只用了“讖书”、“讖”、“图”、“图讖”,而没有使用“纬(书)”这个概念。可是他说到“《河》、《洛》、《六艺》”,依照唐人及后世的一般认识,《河》、《洛》属讖,《六艺》属纬。第二,他只是大略讲到先秦“立言于前,有征于后”、“圣人明”而“智者贵”的“讖书”,与成、哀之后“皮傅”的错谬不经、没有征验的“图讖”,是不完全相同的,而没有更为具体明确的述说。这两点,对东汉人来说,也许容易明白、无需赘言,但后人就难以理解了。所谓“讖纬”,究竟是一是二?先秦“讖书”与西汉“图讖”不尽相同,其同异之纠结演变的情形究竟如何?从张衡的上疏,均得不到明确答案,以致后人持说纷纭。

因此,从历史演变的角度,详细考察两汉讖、纬之分合演变的轨迹,对了解讖纬的起源、性质特征及其复杂变化之情状,实为必须的工作。这个工作,前人已有所涉及。陈槃《论早期讖纬及其与邹衍书说之关系》一文^①,即曾简述讖纬的源起、演变云:

(讖纬)沉淀凝聚约略可分为两重要阶段:盖自战国后期至秦皇世为一阶段。此一阶段之讖纬,虽已由酝酿而始基,然而其书其说,若隐若显。盖其事诡秘,又俗尚尊师重道,故口耳相传,鲜著竹帛。其次两汉三国为一阶段。此一阶段为讖纬极盛时代,风气所趋,用增饰依托,剽窃矫称,假之为干禄取荣之工具,是其特色;于是而纷论无数之卷帙,并出见于此时。吾人今日所见怪奇庞杂之讖纬篇目,即此一阶段之产物也。六朝以来之材料,亦往往而有,然而已属不甚重要。古讖纬之纠结杂糅,层次积累,大抵如此。

陈氏的概述,对讖纬之“极盛时代”以及六朝以后讖纬之价值的评判,均言之有据;惟其将讖纬之“酝酿而始基”阶段上推“战国后期”而止^②,则犹可商榷。实际上,即使根据今天所见之史料,讖验(征验)观念及其行事,至晚在战国前期即已流行。

由于讖纬文献零散错乱、不足以征,本文的考证,只能主要使用讖纬之外的其他史料展开。穷搜

^① 陈槃:《论早期讖纬及其与邹衍书说之关系》,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本上册,1948年。

^② 陈槃《讖纬溯源上》主张讖纬起源于“邹衍及其燕、齐海上之方士”(文载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一本,1944年),所以他把讖纬“始基”上推战国后期为止。

先秦两汉典籍及其他相关史料,以期勾勒出两汉讖、纬之分合演变的较为明确的轨迹。

一、讖验观念:自远古至西汉持续存在

就实质而言,讖验观念是初民感性经验的一种总结。它将某种可感的现象(主要是自然现象)与某种社会或人生的结果联系起来,建立其间的因果关系。因此,“征验”、“纤微”、“秘密”是其重要的思想特征,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色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讖验观念由来已久。刘师培《讖纬论》说:“讖纬之言,起源太古”^①,当即是如此理解。两汉讖纬思潮,与先秦讖验观念,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想说清两汉讖纬状貌,须从先秦的讖验观念说起。

“讖”字虽不见于今存之先秦文献,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字书《尔雅》亦不收此字,但是讲述讖验(征验)之事,却普遍存在于先秦典籍中,可知讖验观念于彼时已深入人心。《诗经》中即有很多例证,如《小雅》之《天保》、《斯干》、《无羊》、《十月之交》、《大雅》之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皇矣》、《生民》、《云汉》、《瞻印》、《召旻》、《周颂》之《昊天有成命》、《敬之》、《商颂》之《玄鸟》等。《尚书》之《洪范》、《金縢》等篇,更是集中讲述了天人相感的讖验观念。此外,先秦史、子书中,亦多有此类记述,兹分类略举数例:

有星孛入于北斗。周内史叔服曰:“不出七年,宋、齐、晋之君皆将死乱。”^②(《左传·文公十四年》)

二十八年春,无冰。梓慎曰:“今兹宋、郑其饥乎!岁在星纪,而淫于玄枵。以有时灾,阴不堪阳。蛇乘龙,龙,宋、郑之星也。宋、郑必饥。玄枵,虚中也。枵,耗名也。土虚而民耗,不饥何为?”……禘灶曰:“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。岁弃其次,而旅于明年之次,以害鸟、帑,周、楚恶之。”^③(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)

这是用星象变化配合相应地域以预测未来人事之例。以星象来预测人事,是古老的知识系统。《周礼·春官·保章氏》载:“保章氏掌天星,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,以观天下之迁,辨其吉凶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,封域皆有分星,以观妖祥。”郑玄注说,讲述九州诸国之封域与天星相配的书籍已经亡佚,“今其存可言者,十二次之分也:星纪,吴越也。玄枵,齐也。娵訾,卫也。降娄,鲁也。大梁,赵也。实沉,晋也。鹑首,秦也。鹑火,周也。鹑尾,楚也。寿星,郑也。大火,宋也。析木,燕也。此分野之妖祥,主用客星彗孛之气为象”。

夏四月,陈灾。郑禘灶曰:“五年陈将复封,封五十二年而遂亡。”子产问其故。对曰:“陈,水属也;火,水妃(同配)也,而楚所相也。今火出而火陈,逐楚而建陈也^④。妃以五成,故曰五年^⑤。岁五及鹑火,而后陈卒亡,楚克有之,天之道也,故曰五十二年^⑥。”(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)

凡帝王者之将兴也,天必先见祥乎下民。黄帝之时,天先见大螾大蜃,黄帝曰“土气胜”,土气胜,故其色尚黄,其事则土。及禹之时,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,禹曰“木气胜”,木气胜,故其色尚青,其事则木。及汤之时,天先见金刃生于水,汤曰“金气胜”,金气胜,故其色尚白,其事则金。及文王之时,天先见火,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,文王曰“火气胜”,火气胜,故其色尚赤,其事则火。

① 刘师培:《左盦外集》卷三,《刘申叔遗书》本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年影印民国二十五年(1936)本,第1371页。

② 杜预注:“后三年宋弑昭公,五年齐弑懿公,七年晋弑灵公。”

③ 杜预注:“岁星所在,其国有福。失次于北,祸冲在南。南为朱鸟,鸟尾曰帑。鹑火、鹑尾,周、楚之分,故周王、楚子受其咎。俱论岁星过次,梓慎则曰‘宋、郑饥’,禘灶则曰‘周、楚王死’,《传》故备举以示卜占唯人所在。”

④ 杜预注:“水得妃(同配)而兴。陈兴则楚衰,故曰‘逐楚而建陈’。”

⑤ 杜预注:“五行各相妃合,得五而成,故五岁而陈复封。”

⑥ 杜预注:“是岁岁在星纪,五岁及大梁,而陈复封。自大梁四岁而及鹑火,后四周四十八岁,凡五及鹑火,五十二年。天数以五为纪,故五及鹑火,火盛水衰。”按:鲁昭公八年(前534)十一月,楚灵王灭陈。五年后,即昭公十三年(前529),楚平王立吴为陈侯(即陈惠公),陈遂复国。五十二年后,即鲁哀公十七年(前478)(一说鲁哀公十六年秋),楚惠王再灭陈。后来发生的史实与禘灶的预测如合符契。

《吕氏春秋·应同》

这是用五行征象来预测或判断人事之例。禘灶据鲁昭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之征象,以及水火相克相配的关系,再联系星象,对陈国未来之国运提出预测。《吕氏春秋》所述,明显是战国阴阳家的“五行相胜”之说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大螾大蝼”、“草木秋冬不杀”、“金刃生于水”、“火,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”这些“天先见”的自然征象,是黄帝、禹、汤、周文王判断各自运命(土、木、金、火)的依据,进而也成为他们各自行事的依据。

初,懿氏卜妻敬仲(陈完)。其妻占之曰:“吉。是谓‘凤凰于飞,和鸣锵锵。有妫(陈之国姓)之后,将育于姜(齐之国姓)。五世其昌,并于正卿。八世之后,莫之与京’。”……及陈之初亡也,陈桓子(即陈无宇,陈完的五世孙)始大于齐;其后亡也,成子(即陈常,陈完的八世孙)得政。(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)

初,毕万筮仕于晋,遇《屯》(震下坎上)之《比》(坤下坎上)。辛廖占之,曰:“吉。《屯》固、《比》入,吉孰大焉?其必蕃昌。震为土(指震变为坤),车从马(震为车,坤为马),足居之(震为足),兄长之(震为长男),母覆之(坤为母),众归之(坤为众),六体不易,合而能固,安而能杀,公侯之卦也。公侯之子孙(毕万为毕公高之后),必复其始。”(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)

(史墨)曰:“……昔成季友,桓之季也,文姜之爱子也。始震(妊娠)而卜,卜人谒之,曰:‘生有嘉闻,其名曰友,为公室辅。’及生,如卜人之言,有文在其手曰‘友’,遂以名之。既而有大功于鲁,受费以为上卿。至于文子、武子,世增其业,不废旧绩。鲁文公薨,而东门遂杀适立庶,鲁君于是乎失国,政在季氏,于此君也四公矣。……”(《左传·昭公三十二年》)

这是以占卜预测未来人事之例。朱熹曾云:“陈敬仲、毕万、季友占筮,皆如后世符命之类。”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春秋左氏传注疏卷八考证》引)清人张尚瑗《左传折诸》卷三“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”条也说:“此传(按:指上列第一条)与史墨论陈亡,皆田氏代齐之符命也;毕万筮仕于晋,魏氏分晋之符命也;季友有文在手,季氏专鲁之符命也。《左氏书》成于战国之初,故于齐、晋、鲁三国谋篡之臣,皆详其讖纬^①。”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)《左传》这类占验故事很多,都是以神秘的“征验”为其基本特征,概属讖类无疑。《左传》中的《易》占故事(如上举第二例),与其他占验故事没有什么区别,都可以划入讖的范畴。

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,嬖人嫫始生孟縶。孔成子(卫国大夫,名烝钮)梦康叔(卫国之始封祖)谓己:“立元(元,孟縶弟。此时元尚未出生),余使鞮(孔成子之子)之孙圉与史苟(史朝之子)相之。”史朝亦梦康叔谓己:“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钮之曾孙圉相元。”史朝见成子,告之梦,梦协。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,嫫始生子,名之曰元。……孔成子以《周易》筮之,曰:“元尚享卫国,主其社稷。”……史朝曰:“……康叔命之,二卦告之,筮袭于梦(谓筮与梦相合)……”故孔成子立灵公(即元)。(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)

虢公梦在庙,有神人面白毛虎爪,执钺立于西阿之下。公惧而走。神曰:“无走!帝命曰:‘使晋袭于尔门。’”公拜稽首。觉,召史嚚占之,对曰:“如君之言,则蓐收也^②,天之刑神也,天事官成^③。”公使囚之,且使人国贺梦^④。舟之侨告其诸族曰:“众谓虢亡不久,吾乃今知之。君不度而贺大国之袭,于己何瘳?吾闻之曰:‘大国道,小国袭焉,曰服。小国教(通“傲”),大国袭焉,曰诛。’民疾君之侈也,是以遂于逆命。今嘉其梦,侈必展,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。民疾其态,天又

① 符命属讖类。并且,所谓“纬”必当在“经”之后,故汉代以前之讖不可称为“讖纬”。张尚瑗此谓“讖纬”,是不准确的。

② 韦昭注:“蓐收,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。”徐元浩《集解》引《礼记·月令》孔疏“蓐收者,言秋时万物摧辱而收敛”,云:“蓐收为肃杀之义,因以名神。”

③ 韦昭注:“官成,祸福各以官象成也。”徐元浩《集解》:“成,疑当为戒字之误。官,主也。天事官成,谓天事主戒也,所以风虢公也。”

④ 韦昭注:“欲转吉之,故使贺也。”

诳之，大国来诛，出令而逆，宗国既卑，诸侯远已，内外无亲，其谁云救之？吾不忍俟也！将行。”以其族适晋。六年，虢乃亡。（《国语·晋语二》）

这是以梦境预断或预告人事之例。孔烝祖等立元为国君（卫灵公），决定于事前的梦境；虢国之被晋所灭，事先也得到神人托梦预告。这类讖验，可谓之“梦讖”。

先秦典籍中以征象预测断事的其他类型的例证还有很多，兹略举几例：

四年春王三月，楚武王荆尸，授师子焉，以伐随。将齐（通“斋”），入告夫人邓曼曰：“余心荡。”邓曼叹曰：“王禄尽矣。盈而荡，天之道也。先君其知之矣，故临武事，将发大命，而荡王心焉。若师徒无亏，王薨于行，国之福也。”^①王遂行，卒于柩木之下。（《左传·庄公四年》）

献公问于卜偃曰：“攻虢，何月也？”对曰：“童谣有之，曰：‘丙之晨，龙尾伏辰^②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旗。鹑之贲贲，天策焯焯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’^③火中而旦，其九月、十月之交乎？”（《国语·晋语二》）

宋康王之时，有雀生鱗于城之隙。使史占之，曰：“小而生巨，必霸天下。”康王大喜。于是灭滕伐薛，取淮北之地。……（《战国策·宋策》）

昔者三苗大乱，天命殛之。有妖宵出，雨血三朝，龙生于庙，犬哭乎市，夏冰，地坼及泉，五谷变化。民乃大振（同震）。高阳乃命[禹于]玄宫，禹亲把天之瑞令，以征有苗。……沓（通“逮”。下同）至乎夏王桀，天有酷命。日月不时，寒暑杂至，五谷焦死，鬼呼[于]国，鹤鸣十夕余。天乃命汤于鑪宫，用受夏之大命。……沓至乎商王纣，天不序其德，祀用失时，兼夜中（按：此处有脱文），十日雨土于薄，九鼎迁止，妇妖宵出，有鬼宵吟，有女为男，天雨肉，棘生乎国道。王兄（读为况）自纵也。赤鸟衔珪，降周之岐社，曰：“天命周文王，伐殷有国。”泰颠来宾，河出《绿图》，地出乘黄。武王践功（孙诒让云：疑为践阼），梦见三神，曰：“予既沉湎殷纣于酒德矣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（读为‘戡’）之。”武王乃攻狂夫（孙诒让云：攻狂夫，疑当为往攻之）。反商之周，天赐武王黄鸟之旗。……（《墨子·非攻下》）

《左传》邓曼以楚武王“心荡”之象预断他出师伐随将会不利，《国语》卜偃引述童谣预示伐虢的时间和结果，此二者都是事先根据某种征象预测未来之结果。《战国策》所载宋康王之灭滕伐薛，《墨子》所载之禹征三苗、商汤灭夏、武王灭商，事前均有某些征象，而成为宋康王、夏禹、商汤、文武王之征伐决断的根据。这些史料，都鲜明地体现着征验（征测）的思想特征，概属讖之范畴。此外，如《管子》之《幼官》、《四时》、《五行》等篇，《吕氏春秋》之十二纪，也有不少此类例证，不赘述。

有一个问题需要简单辨明：《左传》记载史事预测的言论，有不少与后来发生的史实十分吻合，不免令人生疑。对于此种现象的一个合理推测是：这些预测言论，乃是得见事情发生的后人敷衍进去的。这也成为后世质疑《左传》真伪的证据。《左传》之真伪（或有真有伪），是个复杂问题，此处不拟纠缠。对本论题而言，有两点需要说明：第一，《左传》的史事预测，并非完全符合后来的史实。文渊阁《四库全书总目·〈春秋左传正义〉提要》就说：“《左传》载预测祸福，无不征验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。惟哀公九年称‘赵氏其世有乱’，后竟不然，是未见后事之证也。”其实《左传》所载预测不验之事，不止此一件。卫聚贤《古史研究·〈左传〉的研究》指出：“卜辞言‘季氏亡则鲁不昌’（按见闵公二年），事不应，是著者未及见鲁季氏亡。言齐田‘五世其昌，八世之后，莫之与京’，不言其十世为侯，是未及见周安王十六年田和之为侯。又谓‘成王定鼎于郊廓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’（按见宣公三年），三十世为安

① 杜预注：“楚为小国，僻陋在夷，至此武王始起其众，僭号称王。陈兵授师，志意盈满，临齐（通“斋”）而散。故邓曼以天地鬼神为征应之符。”

② 韦昭注：“龙尾，尾星也。伏，隐也。辰，日月之交会也。谓鲁僖五年冬、周十二月、夏十月丙子朔之朝，日在尾，月在天策。伏辰，辰在龙尾，隐而未见。”

③ 韦昭注：“鹑，鹑火，鸟星也。贲贲，鹑貌也。天策，尾上一星名曰天策，一名傅说。焯焯，近日月之貌也。火，鹑火也。中，晨中也。成军，军有成功也。传曰：‘冬十二月丙子朔，晋灭虢，虢公丑奔齐师。’”

王,七百年为安王三年。但安王后尚有四世一百五十三年,若在安王三年时周尚未亡,著者何能如此云云。又言魏子‘其长有后于晋国乎’(按见襄公二十八年),如见魏斯为侯,则应说‘其长有后于魏’,是著者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斯为侯以前之人,而威烈王元年以后之人。”^①预测之有应验、有未应验,恰可说明《左传》成书时间不会很靠后。第二,关于《左传》成书的年代,近代以来颇有疑为刘歆伪造者,那往往是为本文经学张目,不足为信。崔述《洙泗考信录·余录》从文风来判断其时代,最为切理厌心,因为文风是难以伪饰的:“战国之文姿横,而《左传》文平易简直,颇近《论语》及《戴记》之《曲礼》、《檀弓》诸篇,绝不类战国时文,何况于秦?襄、昭之际,文词繁芜,远过文、宣以前,而定、哀间反略,率多有事无词,哀公之末事亦不备,此必定、哀之时,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,故尔。然则作书之时,上距定、哀未远,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。”^②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·前言》经过翔实论证后,得出结论:“《左传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之后,周安王十三年(公元前389年)以前。”^③也就是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。沈玉成《春秋左传学史稿》也说:“自康有为以来倡言《左传》为刘歆伪作之说,可以断然排除。……这部书从草创到写定,应该经历一个过程,具体说,当是草创于春秋末而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,由授受者不断补充润色,大体定型。”^④因此,尽管《左传》所载预测史事之事,是事发之后敷衍进去的,但无论如何,它们都是战国中期之前的史料,代表着先秦人的思想观念。《国语》的情况,亦是如此。

由以上例举可见,作为汉代讖纬主体内容的天文占、五行占、史事讖,以及其他种种讖验,在先秦时期几乎都已存在。只不过,迄今尚未能在先秦典籍中找到把这类事项称作“讖”的史料,可谓有其实而无其名。

从现存史料看,最早以“讖”称呼先秦征验之事的,是《史记·赵世家》:

赵简子疾,五日不知人,大夫皆惧。医扁鹊视之,出,董安于问。扁鹊曰:“血脉治也,而何怪!在昔秦缪公尝如此,七日而寤。寤之日,告公孙支与子輿曰:‘我之帝所甚乐。吾所以久者,适有学也。帝告我:‘晋国将大乱,五世不安;其后将霸,未老而死;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。’”公孙支书而藏之,秦讖于是出矣。献公之乱,文公之霸,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,此子之所闻。今主君之疾与之同,不出三日疾必间,间必有言也。”

居二日半,简子寤。语大夫曰:“我之帝所甚乐,与百神游于钧天,广乐九奏万舞,不类三代之乐,其声动人心。有一熊欲来援我,帝命我射之,中熊,熊死。又有一黑来,我又射之,中黑,黑死。帝甚喜,赐我二笥,皆有副。吾见儿在帝侧,帝属我一翟犬,曰:‘及而子之壮也,以赐之。’帝告我:‘晋国且世衰,七世而亡,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,而亦不能有也。今余思虞舜之勋,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。’”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。

秦缪公病见天帝得告“晋国将大乱,五世不安……”,赵简子病见天帝得告“晋国且世衰,七世而亡……”,其性质与上举诸例没有任何区别,而《史记》称之为“讖”。

陈槃《讖纬溯源上》将讖纬之源头上溯到“邹衍及其燕、齐海上之方士”为止,断言“邹衍以前,无所谓讖”,“讖纬中所载迷信之说,前古多有之。然前古虽亦有此迷信,不可谓此即讖纬也”。其论邹衍之学与讖纬的密切关系堪称翔实有据,而断言邹衍之前无讖,则甚为武断寡证。邹衍之前(乃至邹衍前后)固然无纬,然则亦无讖乎?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所载春秋时征验之事(如上文所举例),与汉世之讖说,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区别。它们固然是后人所敷衍,但毕竟是战国前期的史料(《史记·赵世家》所载,恐亦非史迁妄造,必有先秦史料依据),而邹衍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前后(与燕昭王同

① 转引自张心澄:《伪书通考》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54年,第394页。按:此为张心澄综录卫聚贤之说。卫氏《古史研究》第二编《左传》的研究》(上海:新月书店,1928年)中,原文见于前后多处考证文段。为便利醒目,此处转引张氏综录。

② 崔述:《洙泗考信录》,《丛书集成新编》第6册,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4年影印本。

③ 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1年,第41页。

④ 沈玉成:《春秋左传学史稿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2年,第82页。

时),已是战国后期。然则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之记载怎能简单否认?何以只能称作“迷信”而“不可谓讖”?陈槃力主讖纬是一非二,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那些史料当然不能称为“纬”(事实上汉人亦未称之为“纬”,而均称之为“讖”),为了维护其“讖纬一也”的基本观点,他必然会说“不可谓讖”了。但遗憾的是,陈槃于此关键点,并无任何论证,唯有断言而已^①。

通行的说法,是讖纬始自西汉哀、平之际。此种认识,不仅曲解了张衡(见上述),也与西汉的思想发展实际不符。事实是,自西汉初起,讖验观念便一直存在。并且,据今天可见史料,“讖”字最早即出于汉初贾谊的《鹏鸟赋》:

异物来萃,私怪其故。发书占之,讖言其度,曰“野鸟入室,主人将去”。

这个“讖”字,明显是指讖书;其内容也很清楚,就是征验(根据某种征象而预测未来吉凶)之类^②。这里有两点尤须注意:第一,既言“发书占之,讖言其度”,又引述了具体内容,则贾谊时已有成型的“讖书”^③;第二,根据贾赋的语气,说讖书、用“讖”字平易自如,脱口而出,由此似也可以推测,在汉初的语言实践中,用“讖”字、言讖事当不为新僻。“野鸟入室,主人将去”之讖语,文献记载似亦首见于此赋。但既是贾谊所见之讖书所载,则当是汉初之前即已流传^④。

实际上,贾谊之前的秦汉之际,延续先秦讖验观念,于史籍中亦不乏见。例如:

三十二年(前 215)……始皇巡北边,从上郡入。燕人卢生使入海还,以鬼神事,因奏《录图书》,曰“亡秦者胡也”。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。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

(陈胜吴广)乃行卜。卜者知其指意,曰:“足下事皆成,有功。然足下卜之鬼乎^⑤!”陈胜、吴广喜,念鬼,曰:“此教我先威众耳。”乃丹书帛曰“陈胜王”,置人所罾鱼腹中。卒买鱼烹食,得鱼腹中书,固以怪之矣。又间令吴广之次近所旁丛祠中,夜篝火,狐鸣呼曰:“大楚兴,陈胜王。”卒皆夜惊恐。旦日,卒中往往语,皆指目陈胜。(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)

(高祖)拔剑击斩蛇。……后人来至蛇所,有一老妪夜哭。人问何哭,妪曰:“人杀吾子,故哭之。”人曰:“妪子何为见杀?”妪曰:“吾子,白帝子也,化为蛇,当道,今为赤帝子斩之,故哭。”人乃以妪为不诚,欲笞之,妪因忽不见。……后人告高祖,高祖乃心独喜,自负。诸从者日益畏之。(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)

《秦始皇本纪》所说卢生上奏之《录图书》,就是讖书《河图》^⑥;秦始皇笃信“亡秦者胡”这句讖语,才会发兵击胡。陈胜、吴广假造丹书讖言“陈胜王”,号召起义得成,时人深信讖验之事,无疑是一个重要

① 陈槃另有长文《秦汉间之所谓“符应”论略》(载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六本,1948年),征引宏富史料,论说符应与讖纬之关系。其基本观点是:符应之说出自上古史官,邹衍书因袭增益于上古之符应说,秦汉间符应说出自邹衍,而讖纬则出自秦汉符应说之结集。同时强调,符应说经过方士的增益,“其范围固已扩充至符应思想以外,而自成一组织”,意在说明讖纬与符应之不同。此一论断的问题在于,如果讖纬与先秦符应仅仅是数量或范围上有多寡(或谓因于新时代之形势和需要而有所增益),而没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,则很难说二者是不同的东西。陈氏自己也说:“讖纬出自邹(衍)书,而邹书(对上古史官符应之说)盖亦多所采袭,匪由冯空虚构”,“盖(秦汉)此类符应说之结集,实为讖纬之基本材料”。然则,先秦之符应,亦“不可谓讖”乎?

② 《汉书》卷四十八《贾谊传》颜师古注:“讖,验也,有征验之书也。”

③ 张衡《请禁绝图讖疏》也把“或观星辰逆顺,寒燠所由,或察龟策之占,巫覡之言……立言于前,有征于后”的先秦古书称为“讖书”。可以互证。

④ 《西京杂记》卷五载有“长沙俗以鹏鸟至人家,主人死”之语(刘歆撰,葛洪集,向新阳、刘克任校注:《西京杂记校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248页)。定型的俗世观念,往往历史悠久并能流传久远。

⑤ 裴骃《集解》引苏林曰:“狐鸣祠中则是也。”又引瓚曰:“假托鬼神以威众也。”

⑥ 王充《论衡·实知》:“亡秦者胡”,《河图》之文也。”又,贾谊《新书·修政语上》:“(黄帝)济东海,入江内,取《绿图》,西济积石,涉流沙,登于昆仑。于是,还归中国,以平天下。”《初学记》卷六《地部中·河》引《河图》:“黄帝乃斋河、洛之间,求象见者。至于翠妫泉,大卢鱼折溜而至。……鱼泛白图,蓝菜(按“菜”,疑当为“采”)朱文,以授黄帝。舒视之,名曰《录图》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卷十一《帝王部一·黄帝轩辕氏》引《河图挺佐辅》:“黄帝乃拔斋七日,至于翠妫之川,大鲈鱼折溜而至,乃与天老迎之,五色毕具,鱼泛白图,蓝叶朱文,以授黄帝,名曰《录图》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七十九《皇王部四·黄帝轩辕氏》引《河图挺佐辅》:“黄帝乃拔斋七日……至于翠妫之渊,大卢鱼折溜而至。……独与天老跪而迎之。五色毕具,天老以授黄帝。黄帝舒视之,名曰《录图》。”可知《绿图》、《录图》即《河图》。

原因。刘邦斩白蛇起兵灭秦,虽无讖语出现,但“赤帝子”斩杀“白帝子”之征象,即是“符命”^①,与上举二事都基于同样的社会思想观念。

至西汉时期,讖验繁多。只要翻检一下《汉书》之十二帝纪及其《五行志》、《天文志》、《郊祀志》等,即不难看到:自高祖至平帝,讖验之事无朝无之。其间一个明显变化,是从武帝朝开始,讖验灾祥之类记载显著增多,帝王之天人感应思想更加浓厚鲜明;至成、哀、平(包括王莽)时期,讖事大盛。为免烦琐,以下仅举西汉十二帝各一条讖记以证:

(高祖)元年冬十月,五星聚于东井^②。沛公至霸上。……(《汉书·高帝纪》)

按: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未记此事,然其《张耳陈余列传》载:“张耳败走……甘公曰:‘汉王之入关,五星聚东井。东井者,秦分也。先至必霸。楚虽强,后必属汉。’故耳走汉。”又,《汉书·天文志》:“汉元年十月,五星聚于东井,以历推之,从岁星也。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。故客谓张耳曰:‘东井秦地,汉王入秦,五星从岁星聚,当以义取天下。’秦王子婴降于枳道,汉王以属吏,宝器妇女亡所取,闭宫封门,还军次于霸上,以候诸侯。与秦民约法三章,民亡不归心者,可谓能行义矣,天之所予也。五年遂定天下,即帝位。”

(惠帝四年三月)宜阳雨血。秋七月乙亥,未央宫凌室灾;丙子,织室灾。(《汉书·惠帝纪》)

按:《汉书·五行志中之下》:“惠帝二年(按《惠帝纪》作“四年”),天雨血于宜阳,一顷所,刘向以为赤眚也。……是时,政舒缓,诸吕用事,谗口妄行,杀三皇子,建立非嗣,及不当立之王,退王陵、赵尧、周昌。吕太后崩,大臣共诛灭诸吕,僵尸流血。京房《易传》曰:‘归狱不解,兹谓追非,厥咎天雨血;兹谓不亲,民有怨心,不出三年,无其宗人。’又曰:‘佞人禄,功臣僇,天雨血。’”又,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:“惠帝四年十月(按《惠帝纪》作“七月”)乙亥,未央宫凌室灾;丙子,织室灾。刘向以为元年吕太后杀赵王如意,残戮其母戚夫人。是岁十月壬寅,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。其乙亥,凌室灾。明日,织室灾。凌室所以供养饮食,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,与春秋御廩同义^③。天戒若曰:‘皇后亡奉宗庙之德,将绝祭祀。’其后,皇后亡子,后宫美人有男,太后使皇后名之,而杀其母。惠帝崩,嗣子立,有怨言。太后废之,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。赖大臣共诛诸吕而立文帝,惠后幽废。”

(高后元年)夏五月丙申,赵王宫丛台灾。(《汉书·高后纪》)

按: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:“高后元年五月丙申,赵丛台灾。刘向以为:是时吕氏女为赵王后,嫉妒,将为谗口以害赵王。王不寤焉,卒见幽杀。”

(文帝十六年)秋九月,得玉杯,刻曰“人主延寿”。令天下大酺,明年改元。(《汉书·文帝纪》)

按:新垣平以讖术欺诈文帝之事,《汉书·郊祀志上》所载较详:“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,言:‘长安东北有神气,成五采,若人冠冕焉。或曰东北,神明之舍;西方,神明之墓也。天瑞下,宜立祠上帝,以合符应。’于是作渭阳五帝庙。……明年夏四月,文帝亲拜霸渭之会,以郊见渭阳五帝。……文帝出长门,若见五人于道北,遂因其直立五帝坛。……其明年,平使人持玉杯,上书阙下献之。平言上曰:‘阙下有宝玉气来者。’已视之,果有献玉杯者,刻曰‘人主延寿’。平又言:‘臣候,日再中。’居顷之,日却复中。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,令天下大酺。”

(文帝后元七年)九月(按景帝已于本年六月即位),有星孛于西方。(《汉书·景帝纪》)

按: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下》:“文帝后七年九月,有星孛于西方,其本直尾、箕,末指虚、危,长丈

① 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裴骃《集解》引应劭曰:“秦襄公自以居西戎,主少昊之神,作西畴,祠白帝。至献公时,栎阳雨金,以为瑞,又作畦畴,祠白帝。少昊,金德也。赤帝,尧后,谓汉也。杀之者,明汉当灭秦也。”《汉书·高帝纪赞》:“断蛇著符,旗帜上赤,协于火德,自然之应,得天统矣。”

②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:“东井,秦之分野。五星所在,其下当有圣人以义取天下。”

③ 《左传·桓公十四年》:“秋八月壬申,御廩灾。”杜预注:“御廩,公所亲耕以奉粢盛之仓也。”孔颖达《正义》引《穀梁传》曰:“天子亲耕,以共粢盛;王后亲蚕,以共祭服。国非无良农、工女也,以为人之所尽事其祖祢,不若以己所自亲者也。”

余,及天汉,十六日不见。刘向以为:尾,宋地,今楚彭城也。箕为燕,又为吴、越、齐。宿在汉中,负海之国水泽地也。是时景帝新立,信用晁错,将诛正诸侯王,其象先见。后三年,吴、楚、四齐与赵七国举兵反,皆诛灭云。”又,《汉书·天文志》:“孝景元年正月癸酉,金、水合于婺女。占曰:‘为变谋,为兵忧。婺女,粤也,又为齐。’其七月乙丑,金、木、水三合于张。占曰:‘外内有兵与丧,改立王公。张,周地,今之河南也,又为楚。’其二年七月丙子,火与水晨出东方,因守斗。占曰:‘其国绝祀。’至其十二月,水、火合于斗。占曰:‘为淬,不可举事用兵,必受其殃。’一曰:‘为北军,用兵举事大败。斗,吴也,又为粤。’是岁,彗星出西南(按《景帝纪》作“二年冬十二月,有星孛于西南”)。其三月,立六皇子为王,王淮阳、汝南、河间、临江、长沙、广川。其三年,吴、楚、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、赵七国反。吴、楚兵先至攻梁,胶西、胶东、淄川三国攻围齐。汉遣大将军周亚夫等戍止河南,以候吴、楚之敝,遂败之。吴王亡走粤,粤攻而杀之。平阳侯败三国之师于齐,咸伏其辜,齐王自杀。”

(武帝元光元年)秋七月癸未,日有蚀之。……(元狩元年)五月乙巳晦,日有蚀之。(《汉书·武帝纪》)

按: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下》:“(元光元年)七月癸未,先晦一日,日有食之,在翼八度。刘向以为:前年高园便殿灾,与春秋御廩灾后日食于翼、轸同。其占:内有女变,外为诸侯。其后陈皇后废,江都、淮南、衡山王谋反,诛。”又载:“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,日有食之,在柳六度。京房《易传》推以为:是时日食从旁右,法曰‘君失臣’。明年,丞相公孙弘薨。日食从旁左者,亦君失臣;从上者,臣失君;从下者,君失民。”

(昭帝元凤)三年春正月,泰山有大石自起立,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。(《汉书·昭帝纪》)

按:此事引发了西汉一场政治地震。《汉书·眭弘传》记载甚详:“孝昭元凤三年正月,泰山、莱芜山南,匈匈有数千人声,民视之,有大石自立,高丈五尺,大四十八围,入地深八尺,三石为足。石立后,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。是时,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。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,亦自立生,有虫食树叶成文字,曰‘公孙病已立’。孟推《春秋》之意,以为‘石、柳皆阴类,下民之象;而泰山者,岱宗之岳,王者易姓告代之处。今大石自立,僵柳复起,非人力所为,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。枯社木复生,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。’孟意亦不知其所在,即说曰:‘先师董仲舒有言,虽有继体守文之君,不害圣人之受命。汉家尧后,有传国之运。汉帝宜谁差天下,求索贤人,禅以帝位,而退自封百里,如殷、周二王后,以承顺天命。’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。时昭帝幼,大将军霍光秉政,恶之,下其书廷尉。奏赐、孟妄设祆言惑众,大逆不道,皆伏诛。后五年,孝宣帝兴于民间,即位,征孟子为郎。”又,《汉书·五行志中之下》亦载:“昭帝时,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,一朝起立,生枝叶。有虫食其叶,成文字,曰‘公孙病已立’。又,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。眭孟以为,木阴类,下民象,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。昭帝富于春秋,霍光秉政,以孟妖言,诛之。后昭帝崩,无子,征昌邑王贺嗣位,狂乱失道,光废之,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,是为宣帝。宣帝本名病已。京房《易传》曰:‘枯杨生稊,枯木复生,人君亡子。’”

(宣帝)地节元年春正月,有星孛于西方。……十二月癸亥晦,日有蚀之。(《汉书·宣帝纪》)

按: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下》:“宣帝地节元年正月,有星孛于西方,去太白二丈所。刘向以为:太白为大将,彗孛加之,扫灭象也。明年,大将军霍光薨,后二年,家夷灭。”又,《汉书·天文志》: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,月食荧惑,荧惑在角、亢。占曰:‘忧在宫中,非贼而盗也。有内乱,谗臣在旁。’其辛酉,荧惑入氐中。氐,天子之宫,荧惑入之,有贼臣。其六月戊戌甲夜,客星又居左右角间,东南指,长可二尺,色白。占曰:‘有奸人在宫廷间。’其丙寅,又有客星见贯索东北,南行,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,芒炎东南指,其色白。占曰:‘有戮卿。’一曰:‘有戮王。期皆一年,远二年。’是时,楚王延寿谋逆自杀。四年,故大将军霍光夫人显、将军霍禹、范明友、奉车霍山及诸昆弟宾婚为侍中、诸曹、九卿、郡守皆谋反,咸伏其辜。”

(元帝初元三年)夏四月乙未晦,茂陵白鹤馆灾。诏曰:“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,朕战栗恐惧。不烛变异,咎在朕躬。……其赦天下。”(《汉书·元帝纪》)

按: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:“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,孝武园白鹤馆灾。刘向以为:先是,前将军萧望之、光禄大夫周堪辅政,为佞臣石显、许章等所潜,望之自杀,堪废黜。明年,白鹤馆灾。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,不当在山陵昭穆之地。天戒若曰:‘去贵近逸游不正之臣,将害忠良。’后,章坐走马上林下驰逐,免官。”又,《汉书·翼奉传》:“……夏四月乙未,孝武园白鹤馆灾。奉自以为中,上疏曰:‘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,曰极阴生阳,恐有火灾^①。……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,时加于卯,月宿亢灾,与前地震同法。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。……’”

(成帝永始二年)二月癸未夜,星陨如雨。乙酉晦,日有蚀之。诏曰:“……天著变异,以显朕邽(通“尤”),朕甚惧焉。公卿申教百察,深思天诫……”(《汉书·成帝纪》)

按: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下》:“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,夜过中,星陨如雨,长一二丈,绎绎未至地灭,至鸡鸣止。谷永对曰:‘日月星辰,烛临下土,其有食陨之异,则遐迩幽隐靡不咸睹。星辰附离于天,犹庶民附离王者也。王者失道,纲纪废顿,下将叛去,故星叛天而陨,以见其象。《春秋》记异,星陨最大,自鲁严(即鲁庄公,庄公七年四月“星陨如雨”)以来,至今再见。臣闻三代所以丧亡者,皆繇妇人群小,湛湎于酒。《书》云:‘乃用其妇人之言,四方之逋逃多罪,是信是使。’(见《尚书·泰誓》)《诗》曰:‘赫赫宗周,褒姒灭之’(见《小雅·正月》),‘颠覆厥德,荒沈于酒’(见《大雅·抑》)。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,养生大奢,奉终大厚。方今国家兼而有之,社稷宗庙之大忧也。’京房《易传》曰:‘君不任贤,厥妖天雨星。’”又载:“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,日有食之。谷永以京房《易占》对曰:‘今年二月日食,赋敛不得度,民愁怨之所致也。所以使四方皆见、京师阴蔽者,若曰:人君好治宫室,大营坟墓,赋敛兹重,而百姓屈竭,祸在外也。’”

(哀帝建平二年六月)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讖^②,汉家历运中衰,当再受命,宜改元易号。

诏曰:“汉兴二百载,历数开元。皇天降非材之佑,汉国再获受命之符,朕之不德,曷敢不通!夫基事之元命,必与天下自新,其大赦天下。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,号曰‘陈圣刘太平皇帝’,漏刻以百二十为度^③。”……八月,诏曰:“……朕过听贺良等言,冀为海内获福,卒亡嘉应。皆违经背古,不合时宜。六月甲子制书,非赦令也,皆蠲除之。贺良等反道惑众,下有司。”皆伏辜。(《汉书·哀帝纪》)

按:此事引发了西汉又一场政治地震,《汉书·李寻传》记载甚详。成帝时,齐人甘忠可诈造《天官历》、《包元太平经》,以言“汉家逢天地之大终,当更受命于天”。哀帝初立,夏贺良、解光、李寻等再陈“汉历中衰,当更受命”,于是有改元易号等等之事。又,《汉书·天文志》亦载:“(建平)二年二月,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。传曰:‘彗,所以除旧布新也。牵牛,日、月、五星所从起,历数之元,三正之始。彗而出之,改更之象也。其出久者,为其事大也。’其六月甲子,夏贺良等建言当改元易号,增漏刻。……八月丁巳,悉复蠲除之,贺良及党与皆伏诛流放。其后卒有王莽篡国之祸。”

(平帝元始元年)六月,长安女子有生儿,两头异颈面相乡(通“向”。下文同),四臂共肩俱前乡,尻上有目长二寸所。(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上》)

① 按:去年,翼奉上疏有云:“臣又闻未央、建章、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,皆不得天性。若杜陵园,其已御见者,臣子不敢有言……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,宜为设员,出其过制者。此损阴气应天救邪之道也。今异至不应,灾将随之。其法大水,极阴生阳,反为大旱,甚则有火灾……”。

②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:“高祖感赤龙而生,自谓赤帝之精。良等因是作此讖文。”《汉书·王莽传上》:“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,更为太初元将元年。案其本事,甘忠可、夏贺良讖书藏兰台。”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之《前汉书卷十一考证》:“臣(齐)召南按:‘讖’字始见于此(按:此说误。贾谊《鹏鸟赋》、《史记·赵世家》均已有“讖”字)。高祖以斩白蛇,旗帜上赤。然张苍谓汉本水德,公孙臣非之。至武帝时,犹谓以土德王,未有言火德者也。赤精子之说,亦起于此。”

③ 颜师古注:“旧漏昼夜共百刻,今增其二十。此本齐人甘忠可所造,今贺良等重言,遂施行之。”

按: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上》:“京房《易传》曰:“睽孤,见豕负涂”(《易·睽卦》上九爻辞),厥妖人生两头。下相攘善,妖亦同。人若六畜首目在下,兹谓亡上,正将变更。凡妖之作,以谴失正,各象其类。二首,下不壹也;足多,所任邪也;足少,下不胜任,或不任下也。凡下体生于上,不敬也;上体生于下,媾渎也。生非其类,淫乱也。人生而大,上速成也;生而能言,好虚也。群妖推此类,不改乃成凶也。”

以上例举西汉十二帝讖验之记载及其时学人的阐释,足以证明:整个西汉时期,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,始终存续着先秦以来的讖验观念,从未断绝。历来通行的“讖纬起于哀、平”之说,其实并不确切,可不攻自破矣。

至王莽,迷信图讖,以图讖符命摄政、即真以及行政、拜官加爵种种可笑之事,其“班《符命》四十二篇于天下”,《汉书·王莽传》记载甚详。再到刘秀乃至整个东汉时期,图讖盛行,自不待言。

综上所述,讖验观念自远古直至汉末一直存在,始终不曾断绝。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。

西汉文帝二年(前178)十一月日食之后的诏书,值得特别提出:

朕闻之:天生民,为之置君以养治之。人主不德,布政不均,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。乃十一月晦,日有食之,适(读为“谪”)见于天,灾孰大焉!朕获保宗庙,以眇眇之身,托于士民君王之上,天下治乱,在予一人,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。朕下不能治育群生,上以累三光之明,其不德大矣。令至,其悉思朕之过失,及知见之所不及,旬以启告朕。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,以匡朕之不逮。因各敕以取任,务省繇费以便民。朕既不能远德,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,是以设备未息。今纵不能罢边屯戍,又飭兵厚卫,其罢卫将军军。太仆见马遗财足,余皆以给传置。(《汉书·文帝纪》)

文帝此诏,显然已经充满天人感应的讖验思想,极可重视:第一,它是汉代把灾异与政治直接而紧密地联系起来的第一个诏书,并且早于董仲舒的思想活动(董仲舒景帝时始为博士,其思想真正产生影响又是在武帝时);第二,此诏书中天人(君)相感应之基本思想、对待灾异之敬惧态度和果断采取相应措施之行政策略,甚至诏书之行文结构,都是发凡创例,成为其后汉帝同类诏书和行政取向的范本;第三,此诏书事实上也深刻影响了其后学者的思想取向,显例如董仲舒、刘向,他们对春秋的“日食三十六”,几乎是逐一作出解释,无一例外地都把日食天象与弑君、灭国、兵戎等社会政治事件联系起来,认为二者有相互感应关系。对西汉的部分日食,刘向、谷永等也有同类的推阐、解说,而京房的《易传》,往往被当做他们的理论依据(参见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下》)。西汉中后期学者的此类讖验思想,无疑曾得到过这位后世倍加景仰的圣明帝王的指引和鼓舞。

二、“纬书”之“纬”:东汉后期始见,而有名无实

明确了先秦至汉末始终存在“讖”思想,再来看“纬”的情况。首先一个事实是,自明人孙穀《古微书》至今的讖纬辑佚书,无论其称《纬书》、《集纬》、《七纬》、《通纬》、《纬攷》,还是《纬书集成》,其实际内容都不过是“讖”书之残存而已;倒是孙穀称之为“微书”,最为切合实际。古今许多学人,正是把此种情形当作讖、纬无别的重要证据之一。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,所以如此,是因为所谓“纬书”根本就不存在,“纬书”实即“讖书”(以讖“纬”经之书);以“纬”称之,是后汉图讖学者企图将图讖与“经”相并列,自我高尚而已(详下)。因此,这里考察先秦两汉“纬”的情实,只能从其字义、字用的角度进行。

先把存世的唐前字书对“纬”字的释义,集中于下:

《说文解字·糸部》:“经,织从丝也”;“纬,织衡丝也。”

《释名·释典艺》:“经,径也,常典也,如径路无所不通,可常用也。纬,围也,反覆围绕以成经也。”

《广雅·释言》:“纬,横也。”

《玉篇·糸部》:“纬,横织丝。经,常也。经、纬以成缁帛也。”

“纬”字亦不见于《尔雅》。由以上释义可以显见：“纬”字的含义，从来都是与“经”相配的，本义是“织物的横线”。延伸到指谓书籍这个含义，“纬”也是指与“经”直接相关、阐释“经”的书（《释名》所谓“反覆围绕以成经”），并没有“讖”字所包含的“征验”、“纤微”、“秘密”一类意思。

再看“纬”字在西汉（含）以前实际的使用情况。还是先把这个时期传世典籍中有“纬”字的史料集中于下：

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·匠人》：“国中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。”^①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四年》：“嫠不恤其纬。”^②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：“礼，上下之纪，天地之经纬也。”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：“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，以经纬其民，卿大夫以序守之，民是以能尊其贵，贵是以能守其业。”

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“比于文王”《毛传》：“经纬天地曰文。”（以上经部）

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：“天六地五^③，数之常也。经之以天，纬之以地。经纬不爽，文之象也。”

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：“经纬天地曰文。道德博厚曰文。学勤好问曰文……”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《之罘刻石》：“周定四极，普施明法。经纬天下，永为仪则。”

《史记·礼书》：“观三代损益，乃知缘人情而制礼，依人性而作仪，其所由来尚矣。人道经纬，万端规矩，无所不贯。”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紫宫、房心、权衡、咸池、虚危列宿部星，此天之五官坐位也，为经，不移徙，大小有差，阔狭有常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填星，此五星者，天之五佐，为纬，见伏有时，所过行赢缩有度。”^④

《汉书·律历志上》：“绳者，上下端直，经纬四通也。”又：“中央者，阴阳之内，四方之中，经纬通达，乃能端直，于时为四季。”又：“三辰之合于三统……五星之合于五行……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。”

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：“土、木相乘而合经纬为三十，是为镇星小周。”

《汉书·礼乐志》载《安世房中歌》第二章：“清思眇眇，经纬冥冥。”^⑤

《汉书·礼乐志》载《郊祀歌·惟泰元》：“经纬天地，作成四时。精建日月，星辰度理。阴阳五行，周而复始。”

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：“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相为经纬。八卦、九章，相为表里。”

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上》引京房《易传》：“赋敛不理兹谓祸，厥风绝经纬。”^⑥

《汉书·李寻传》：“五经六纬^⑦，尊术显士。”

《汉书·扬雄传下》载《法言》序目：“神心智悦，经纬万方，事系诸道德、仁谊、礼。撰《问神》第五。”

《汉书·王莽传上》载元始五年诏策：“钦承神祇，经纬四时，复千载之废，矫百世之失，天下和会，大众方辑。”（以上史部）

《管子·五行》：“故通乎阳气，所以事天也，经纬日月，用之于民。通乎阴气，所以事地也，经纬星历，以视其离。”

① 郑玄注：“国中，城内也。经纬，谓涂也。经纬之涂，皆容方九轨。”

② 杜预注：“嫠，寡妇也。织者常苦纬少，寡妇所宜忧。”

③ 韦昭注：“天有六气，地有五行。”

④ 张守节《正义》：“五星行，南北为经，东西为纬也。”

⑤ 颜师古注：“经纬，谓经纬天地。”

⑥ 颜师古注引如淳曰：“有所破坏，绝匹帛之属也。”又引晋灼曰：“南北为经，东西为纬，丝因风暴乱不端理也。”

⑦ 此处所谓经纬，均指星宿，详见下文。

《庄子·寓言》：“(耆艾)年先矣，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，是非先也。”^①

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将原先王、本仁义，则礼正其经纬、蹊径也。”

《荀子·解蔽》：“参稽治乱而通其度，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。”

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：“凡地形，东西为纬，南北为经。”

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：“夫作为书论者，所以纪纲道德，经纬人事，上考之天，下揆之地，中通诸理。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，繁然足以观终始矣。”

《说苑·正谏》：“合菽粟之微以满仓廩，合疏缕之纬以成帷幕。”

《太玄·玄测序》：“经则有南有北，纬则有西有东。”

《太玄·应》：“一从一横，经纬陈也。”

《太玄·玄莹》：“东西为纬，南北为经。经纬交错，邪正以分。”又：“立天之经曰阴与阳，形地之纬曰从与横。……阴阳曰合其判，从横曰纬其经。……阳不阴无与合其施，经不纬无以成其谊。”(以上子部)

《离骚》：“纷总总其离合兮，忽纬緼其难迁。”^②(以上集部)

从以上史料看，西汉(含)以前的“纬”字使用，除了其本义“织物的横线”外，还有“组织(治理)”、“伦理”、“星宿”、“地理方向上的东西向”这几个衍生义，而绝无“征验”、“纤微”、“秘密”一类含义，与“讖”字之义域界划分明，完全不见用“纬”字明确称呼后世所谓“讖纬”学、“讖纬”书的例证。

而陈槃《讖纬释名》一文，曾举出《小黄门譙敏碑》，以证明“‘纬’之称，大抵可能早推至于昭、宣帝之世”；又举出《华阳国志》的一条材料，云“成帝之世，(‘纬’之称)亦有可考者”^③。其实都是错解或误读。《小黄门譙敏碑》有云：“(譙敏)其先故国师譙赣，深明典奥、讖录、图纬，能精微天意。传道与京君明。”^④譙赣即焦赣(焦延寿)，活动于西汉昭、宣、元帝时期，曾传授京房《易》学(见《汉书·京房传》)。问题是，此碑文末分明写有“中平四年七月廿八日癸卯造”，乃是东汉灵帝末年之人所作^⑤。其所谓“图纬”，显然不能必然地当作焦赣时代的词语。而《华阳国志》卷十中《广汉士女》所载“王延世，字长叔，资中人也。建始五年，河决东郡，泛滥兖豫四郡三十二县，没官民屋舍四万所。……汉史案图纬，当有能循禹之功者，在韃、柯之资阳求之，正得延世”一条材料，其“汉史案图纬……正得延世”几句话，乃是后人伪造窜入的；其不足为据，任乃强辨之甚力：“‘汉史案图纬’求得延世一节，不见《汉书》。《汉纪》、《通鉴》均不著录。由旧刻注文有‘资阳’二字，可疑此节系隋唐人妄为窜入。《两汉》、《晋》、《宋》、《齐》等史书的《地理(郡县)志》皆只有资中县，无资阳。今资阳县，即汉魏六朝之资中县治。后周始改名资阳，为资州资阳郡治，并分资中为磐石县，属焉。隋徙资州治磐石，资阳县属之。王延世本资中县人，家所在，为周、隋以来之资阳县，此非常璩所及知。……且韃、柯，当指韃为、牂柯两郡。即使‘资阳’为‘资中’钞讹，其地实在韃为之东北，与蜀、广汉近，去牂柯绝远。曰‘韃、柯之资阳’，实不成文。疑是迷信图纬者造此说，窜乱于常氏文中。因其用‘资阳’字，故可疑为隋唐人所为也。”^⑥如此，则这条史料中“图纬”之称，当然不可径作汉成帝时词语。

真正有可能被解读为西汉时期以“纬”指称讖纬或讖纬书的，是陈槃未及引证的这条材料：

(李寻)说(王)根曰：“《书》云‘天聪明’，盖言紫宫极枢，通位帝纪，太微四门，广开大道，五经六纬，尊术显士，翼、张舒布，烛临四海，少微处士，为比为辅，故次帝廷，女宫在后。圣人承天，贤

① 成玄英《疏》：“上下为经，傍通曰纬。”

② 王逸注：“纬，緼，乖戾也。”《玉篇·糸部》：“緼，乖戾也。”钱锺之《离骚集传》：“纬，织丝也。緼，结碍也。”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：“纬，如纬丝之緼结，乖戾不就绪也。”

③ 陈槃：《讖纬释名》，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一本，1944年。

④ 洪适：《隶释》卷十一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。

⑤ 此碑文相传为蔡邕所作，见《通志》卷七十三《金石略第一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十三《河北道十二》。

⑥ 任乃强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586页。

贤易色，取法于此。”（《汉书·李寻传》）

这里所谓“五经六纬”，孟康、颜师古以为指《五经》纬和《乐纬》，张晏以为指《五经》纬和《孝经纬》。古近多有学者照此理解^①，其实均属望文生义的轻率误读。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引北宋刘攽曰：“正言星宿，何故忽说《五经》？盖谓二十八舍。”可谓一语中的！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之《前汉书卷七十五考证》亦云：“师古用孟康说，而刘攽驳之，谓‘正说星宿，何故忽说《五经》’，其论甚合。”观李寻原文，稍稍思之即不难理解：上下文都是铺陈星宿，则此“五经六纬”，自然不可能作别样突兀的解释。至于“五经六纬”究竟指哪些星宿，则后人说法不同^②。

在西汉及西汉以前的典籍中，除上述三条曾被误解的材料（其实陈槃所举二条均非西汉史料）外，再也没有其他可能被解释为用“纬”字称呼谶纬或谶纬书的史料了。

据今天所见的史料，到东汉后期，“纬”字已被用作称呼“谶纬”学或“谶纬”书：

少以好学，游心典谟。既综七经，又精群纬。钩深极奥，穷览妙旨。居则玩其辞，动则察其变。云物不显，必考其占。故能独见前识，以先神意。（蔡邕《玄文先生李子材铭》）

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。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，盖发其伪也。有起于中兴之前，终、张之徒之作乎？（荀悦《申鉴·俗嫌》）

张逸问：“《礼注》曰‘书说’。书说，何书也？”答曰：“《尚书纬》也。当为注时，时在文网中，嫌引秘书，故诸所牵图谶皆谓之‘说’。”（《郑志》卷中）

《春秋纬》云：“河以通乾出天苞，洛以流坤吐地符。”河龙图发，洛龟书感。《河图》有九篇，《洛书》有六篇。（王应麟辑《周易郑康成注·系辞》“河出图，洛出书”郑玄注）

依上可见，东汉后期，用“纬”字称呼“谶纬”学、“谶纬”书，已经比较通行。至于“纬”字究竟何时开始被赋予这个含义，则因于史料乏征，还不易说得准确，要必在东汉刘秀“宣布图谶于天下”之后而不会更早，则似可以断定（详下）。

“谶”之称始于汉初，“纬”之称东汉后期始见，那么“谶纬”凝为一词又在何时呢？

先秦两汉的所有传世文献中，都没有“谶纬”一词；此一词语之最早出处，盖为《三国志》，凡二见：

（建安二十五年，刘豹、向举等）上言：“臣闻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《五经》谶纬，孔子所甄，验应自远。……”……（许靖、糜竺、诸葛亮等）上言：“……二祖受命，图、书先著，以为征验。今上天告祥，群儒英俊，并进《河》、《洛》，孔子谶记，咸悉具至。……考省《灵图》，启发谶纬，神明之表，名讳昭著。宜即帝位，以纂二祖，绍嗣昭穆，天下幸甚。”（《蜀书·先主传》）

此为引录刘备诸臣的上奏之言，当可确认为汉末魏初之语。与此时代较近的称呼“谶纬”者有：

建武初，博士淮阳薛汉传父业，尤善说灾异谶纬，受诏定图谶。当世言《诗》推为长。（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卷下《韩诗》）

自诸子谶纬，圣人秘要，莫不引譬取喻。（《弘明集》卷一载《牟子理惑论》）

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书虽不伪，但此书大抵是后人从《毛诗正义》中辑出，且窜乱讹误较多（参见张心澄《伪书通考》）。此数语（尤其“尤善说灾异谶纬”句）与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所述相同，孰为先后，容有可疑。《弘明集》所载《牟子理惑论》，题为“汉牟融”撰。其《序》称“灵帝崩后，天下扰乱”，

① 如：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八《经说》：“按李寻有‘五经六纬’之言，盖起于哀、平。至光武笃信之，诸儒习为内学。”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卷七“第九十九”条按语：“读班书《李寻传》，成帝元延中，寻说王根曰‘五经六纬，尊术显士’，则知成帝朝已有纬名。”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卷十九：“《李寻传》‘五经六纬，尊术显士’，言纬者始见于此。”钟肇鹏《谶纬论略》引据阎若璩以上说法后，谓：“阎若璩推阐张衡之说，认为成帝时已有纬名，而图谶成于哀、平之际，是颇有见地的。”（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23页）

② 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：“姚鼐云：‘言天文当为人主所取法。此五经者，五经星也。六纬者，十二次相向为六。故人主当法之，以尊五行之术，显十二州之土耳。与经书、谶纬何涉哉？’先谦案：《天文志》：‘太微廷掖门内六星，诸侯。其内五星，五帝坐。’五帝者，《晋志》：‘黄帝坐在太微中，四帝星夹黄帝坐。’盖即五经。六纬者，六诸侯。《天官书》同。盖汉世天文家说如此。姚谓五经为五经星，六纬为十二次，上下文义不属，疑非。”

“牟子将母避世”，精研佛道，撰《理惑论》。察《后汉书》本传，牟融卒于汉章帝建初四年，且两汉并无其他以“牟融”知名者，则所谓汉牟融《理惑论》为后人伪托无疑。明人胡应麟已云：“尝疑六朝晋宋间文士，因儒家有牟子，伪撰此论。”（《四部正讹》卷下）因此，《理惑论》所谓“讖纬”，并非汉人言语。

前四史使用“讖纬”一词的，还有《后汉书》，亦仅二见：

（薛汉）少传父业，尤善说灾异讖纬，教授常数百人。建武初，为博士，受诏校定图讖。当世言《诗》者，推汉为长。（《儒林·薛汉传》）

（廖扶）遂绝志世外，专精经典，尤明天文、讖纬、风角、推步之术。（《方术·廖扶传》）

此二条，乃是范史叙述之言，能否当作薛汉（刘秀、明帝时）、廖扶（安、顺、桓帝时）时代的语汇，尚可斟酌。

据上述，今天能够确定的是：“讖纬”一语始见于汉末魏初。其凝为专指名词，尚在以“纬”字指称后世所谓“讖纬”学、“讖纬”书之后。

三、讖纬的思想实质：以讖“纬”经

根据以上梳理，西汉初即有以“讖”字称呼讖书或讖事的情形。而用“纬”字称呼后世所谓讖纬学或讖纬书，西汉及西汉以前尚无例证，这个概念直到东汉后期才出现。至于“讖纬”合称并凝为一专指词，则更要到汉末魏初时才可见到。当然，一个定型概念的出现和通行，往往会晚于它所指称的事实。讖事讖语、讖验观念早在先秦就已流行，而“讖”这个名称西汉初始见。以“纬”或“纬书”称呼后世讖纬学或讖纬书，到东汉后期始见，而经、讖牵合（以讖“纬”经）之事，根据现存史料，则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初期。也就是说，伴随着儒家经学的兴起，以讖“纬”经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《经部·易类六》附录《易纬》案语：“伏生《尚书大传》、董仲舒《春秋阴阳》，核其文体，即是纬书。”此论未必精确，但甚有启发。《汉志·六艺略》尚书类著录“《经》二十九卷，《传》四十一篇”，均为伏生所传。这四十一篇《传》，即《尚书大传》^①。今观《尚书大传》佚文，依托经典而醇正解释、阐发的文字（即“传”）当然很多，但是其中亦不乏讖验观念（即“讖”）在，与其前后同类的思想观念并无二致。例如：

七政，谓春、秋、冬、夏、天文、地理、人道，所以为政也。人道正而万事顺成。又七政布位，日月，时之正；五星，时之纪。日月有薄食，五星有错聚。七者得失，在人君之政，故谓之政。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收录（清）孙之騄辑本卷一）

武丁祭成汤，有雉飞升鼎耳而雉。问诸祖己，曰：“雉者，野鸟也，不当升鼎。升于鼎者，欲为用也。无则，远方将有来朝者乎？”故武丁内反诸己，以思先王之道。三年，辨发重译至者六国。（同上卷二）

《崇文总目·书类·尚书大传三卷》云：“伏生本秦博士，以章句授诸儒，故博引异言，援经而申证云。”“援经而申证”，是确认其“传”经（说经）的基本性质；而所谓“异言”，当即指其中讖验之类言语。也就是说，“传”、“讖”集于《尚书大传》一身。这个评论，四库馆臣说得更明确：“其文或说《尚书》，或不说《尚书》，大抵如《诗外传》、《春秋繁露》，与经义在离合之间。……其第三卷为《洪范五行传》，首尾完具，汉代纬候之说，实由是起。”又案云：“《尚书大传》于经文之外，掇拾遗文，推衍旁义，盖即古之纬书。”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十二《经部·书类二》附录《尚书大传四卷补遗一卷》）“与经义在离合之间”，确是抓准了《尚书大传》基本特质。四库馆臣判定它就是“古之纬书”，此点尚可商酌；但如果说它是纬书之滥觞，亦无不可。今详核《尚书大传》佚文，其“传”经（说经）的目的明确，同时也蕴含着明显的讖验观念。由此可证，汉初即已出现以讖“纬”经，经、传、讖牵合之现象。

伏生活动于汉文帝之前。四库馆臣提到的《（韩）诗外传》，其作者韩婴主要活动于文、景时期，文

① 参见张舜徽：《汉书艺文志通释》，《张舜徽集》第一辑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。

帝时立为博士。今存《韩诗外传》佚文中，亦不乏如下一类言论：

国无道则飘风厉疾，暴雨折木，阴阳错氛，夏寒冬温，春热秋荣，日月无光，星辰错行，民多疾病，国多不祥，群生不寿，而五谷不登。当成周之时，阴阳调，寒暑平，群生遂，万物宁。故曰：其风治，其乐连，其驱马舒，其民依依，其行迟迟，其意好好。《诗》曰：“匪风发兮，匪车揭兮，顾瞻周道，中心慙兮。”^①

有殷之时，谷生汤之廷，三日而大拱。汤问伊尹曰：“何物也？”对曰：“谷树也。”汤问：“何而生于此？”伊尹曰：“谷之出泽，野物也。今生天子之庭，殆不吉也。”汤曰：“奈何？”伊尹曰：“臣闻：妖者，祸之先；祥者，福之先。见妖而为善，则祸不至；见祥而为不善，则福不臻。”汤乃齐（同斋）戒静处，夙兴夜寐，吊死问疾，赦过赈穷，七日而谷亡。妖孽不见，国家其昌。《诗》曰：“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”^②

《韩诗外传》中此类话语甚夥，其与《尚书大传》性质基本相同，均为以讖“纬”经（以讖说经）之属。景帝、武帝以还，以讖“纬”经之事持续存在。《汉书·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》云：

幽赞神明，通合天人之道者，莫著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……汉兴，推阴阳言灾异者，孝武时有董仲舒、夏侯始昌；昭、宣则眭孟、夏侯胜；元、成则京房、翼奉、刘向、谷永；哀、平则李寻、田终术。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。察其所言，仿佛一端。假经设谊，依托象类，或不免乎“亿则屡中”。

这里举出的景、武之后的“推阴阳言灾异者”，其实也就是常常牵合经（多为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）、讖以议论时事者。所谓“假经设谊（义），依托象类”，就是指出了这个思想特点。

这些人物中，最应注意的是“一代儒宗”董仲舒。董仲舒的著作，今仅存残缺的《春秋繁露》，以及史籍中引述的片段文字。不过，仅由此残存文字，仍可见到他牵合经、传、讖的思想特征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大量记载春秋时期的星象异变、地震、水旱及其他种种灾异，往往引述董仲舒的解说。而这些解说，明显都是以天人感应的讖验观念来解释春秋史迹，以推阐《春秋》经之“大义”。其《春秋繁露》，借《春秋》经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，思理醇正（即苏舆所谓“说经体”，其实就是“传”之一种），与《五行志》作为专题记录神秘征验之内容者有很大不同，但也不乏讖验思想。略举二例以证：

《春秋》何贵乎元而言之？元者，始也，言本正也；正^③，王道也；王者，人之始也。王正，则元气和顺、风雨时、景星见、黄龙下；王不正，则上变天，贼气并见^④。五帝三王之治天下，不敢有君民之心，什一而税，教以爱，使以忠，敬长老，亲亲而尊尊，不夺民时，使民不过岁三日，民家给人足。……故天为之下甘露，朱草生，醴泉出，风雨时，嘉禾兴，凤凰麒麟游于郊。……周衰，天子微弱，诸侯力政，大夫专国，士专邑，不能行度制、法文之礼。诸侯背叛，莫修贡聘奉献天子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孽杀其宗，不能统理，更相伐铍以广地。以强相胁，不能制属。强奄弱，众暴寡，富使贫，并兼无已。臣下上僭，不能禁止。日为之食，星陨如雨。雨螽。沙鹿崩。夏大雨水，冬大雨雪^⑤。陨石于宋五，六鷁退飞。陨霜不杀草。李梅实。正月不雨，至于秋七月。地震，梁山崩，壅河三日不流。昼晦。彗星见于东方，孛于大辰。鸛鹄来巢。《春秋》异之，以此见悖乱之征。（《王道》）

四法修于所故^⑥，祖于先帝，故四法如四时然，终而复始，穷则反本。四法则天^⑦，施符授圣

① 许维通：《韩诗外传集释》卷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74页。

② 许维通：《韩诗外传集释》卷三，第80—81页。

③ “正”，原作“道”，据苏舆《义证》校改。

④ 《管子·四时》：“春凋、秋荣、冬雷、夏有霜雪，此皆气之贼也。刑德易节失次，则贼气遽至；贼气遽至，则国多灾殃。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，作教而寄武焉，作祀而寄德焉。此三者，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。”

⑤ “夏大雨水”二句，苏舆《义证》疑本当作“大雨雷电，又大雨雪”。

⑥ “四法”，即下云“主天法商而王”、“主地法夏而王”、“主天法质而王”、“主地法文而王”。

⑦ “则”，原作“之”，据苏舆《义证》校改。

人；王法则性命，形乎先祖，大昭乎王君。故天将授舜，主天法商而王，祖锡姓为姚氏。至舜形体，大上而员首，而明有二童子，性长于天文，纯于孝慈。天将授禹，主地法夏而王，祖锡姓为姒氏。至禹生，发于背，形体长，长足胥，疾行先左，随以右，劳左佚右也。性长于行，习地明水。天将授汤，主天法质而王，祖锡姓为子氏。谓契母吞玄鸟卵生契，契生^①，发于胸，性长于人伦。至汤，体长专小，足左扁而右便，劳右佚左也。性长于天光，质易纯仁。天将授文王，主地法文而王，祖锡姓姬氏。谓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。后稷长于邠土，播田五谷。至文王，形体博长，有四乳而大足，性长于地文势。故帝使禹、皋论姓，知殷之德阳德也，故以子为姓；知周之德阴德也，故以姬为姓。故殷王改文，以男书子，周王以女书姬。故天道各以其类动，非圣人孰能明之？（《三代改制质文》）

《王道》所述，是董子典型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思想。其《必仁且智》篇精练地阐述了灾异之于国家政治的关系：“天地之物，有不常之变者，谓之异；小者谓之灾。灾常先至，而异乃随之。灾者，天之谴也；异者，天之威也。谴之而不知，乃畏之以威。……凡灾异之本，尽生于国家之失。国家之失乃始萌芽，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；谴告之，而不知变，乃见怪异以惊骇之；惊骇之，尚不知畏恐，其殃咎乃至。”此种天有意志、权威及谴告、惩戒功能的天人感应观念，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与谶纬当中的“天文占”、“五行占”无论在表述上还是思想理路上，均无本质区别。

《三代改制质文》讲的是君权天授的思想。其《符瑞》篇所谓“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，西狩获麟，受命之符是也。然后讬乎《春秋》正不正之间，而明改制之义”，说孔子受天命撰著《春秋》以明改制之义，“西狩获麟”便是其征象（“受命之符”）。与上面引文中舜“大上而员首，而明有二童（瞳）子”，禹“生发于背”、“疾行先左随以右”，“契母吞玄鸟卵生契”、“契生发于胸”、“足左扁而右便”，“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”，文王“四乳而大足”等等受命之征象，都出于同一思理，与谶纬中的符命思想如出一辙，无非都是牵合天人以“考命、象之为”（《符瑞》）罢了。

卢文弨曾说：“此书之大旨在乎仁义，仁义本乎阴阳。……董子之论，固非倚于一偏者。”（苏舆《春秋繁露义证》附录《春秋繁露考证》之《四库馆奏进书后》卢氏案语）《春秋繁露》依托《春秋》经以建构其“三科九旨”之思想体系，其大体为醇正的“传”（说经体）无疑；同时，它贯穿着阴阳五行思想观念，以天人感应作为其社会政治伦理之基本原理，并讲述神秘的谶验之事以为论断，存在与先秦谶言性质不二者。因此，《春秋繁露》的基本性质，因其具有依托《春秋》经进行的醇正思想体系的建构，自然不可像四库馆臣那样径指为（谶）纬书，但其思想建构的基础思路及其结撰方式，在纠合经、传、谶于一体方面，与《尚书大传》、《韩诗外传》实无本质不同。如果说《尚书大传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春秋繁露》一类著述就是（谶）纬书，固然言之太过；但若说它们是后世纬书之滥觞，当不为无据^②。

董仲舒之后，眭孟、刘向、京房、翼奉、谷永、李寻等，大抵都是沿着牵合经、谶的路数展开他们的政治思想活动。

到两汉之际以至东汉，以谶“纬”经（以谶说经）之事更是风起云涌，学者多不胜举，《后汉书》所记述“善图纬”、“善图谶”云云者都是。在这一思想潮流中，以下三个结点尤其重要意义：

（1）（刘秀中元元年）宣布图谶于天下。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下》）

此事的重大意义在于，刘秀作为刘汉王朝功勋卓著的中兴帝王，郑重、正式地向天下宣布图谶，以强势的政治行为，极大地提升了图谶的思想文化地位，使之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纲领之一，对后汉

① “生”，原作“先”，据苏舆《义证》校改。

② 章太炎之说亦可为佐证：“及燕、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，说经者多以巫道相糅，故《洪范》，旧志之一篇耳，犹相与抵掌树颊，广为抽绎。伏生开其源，仲舒衍其流。是时适用少君（翼奉）、文成（齐人少翁）、五利（胶东人栾大）之徒，而仲舒亦以推验火灾，救旱止雨，与之校胜，以经典为巫师豫记之流。而更曲傅《春秋》，云为汉氏制法，以媚人主，而禁政纪。……（自尔）巫道乱法，鬼事干政，尽汉一代，其政事皆兼循神道。”（《太炎文集初编》卷二《驳建立孔教议》，《章氏丛书》下册，台北：世界书局，1982年影印本）

的政治文化乃至一般思想文化都具有强力的指引甚至规范作用。尽管章帝之后,古文经学逐渐兴起^①,但是由刘秀颁布的图讖政治思想始终不曾衰歇。与此相伴随的,自然是一班学者的趋之若鹜,苏竞、杨厚、郎顛、襄楷等,即是代表。还有醇正儒者如贾逵,也因趋奉图讖之学,而颇遭病诟。而那些明显不甚合作的学者如桓谭、郑兴、尹敏等,则遭受冷遇^②。如此,导致东汉时期上上下下莫不弥漫着图讖政治思想文化的气氛。与此相关的另一事,也须明确:刘秀正式向天下宣布图讖之前,必然经过整理。其整理之详情,史籍虽无专门记载,但痕迹犹存: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之《尹敏传》:“帝以(尹)敏博通经、记,令校图讖。”(《后汉纪》卷八、《东观汉记》卷十六均载此事)又《薛汉传》:“建武初,为博士,受诏校定图讖。”此可说明,刘秀末年宣布的图讖,必然是比较完整而系统的,不会像今天所见之讖纬佚文那样零散错乱。

(2)(明帝永平三年)秋八月戊辰,改大乐为大予乐。(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)

此事《后汉书·曹褒传》记载较详:“显宗即位,(曹)充上言:‘汉再受命,仍有封禅之事,而礼乐崩阙,不可为后嗣法。五帝不相沿乐,三王不相袭礼,大汉当自制礼,以示百世。’帝问:‘制礼乐云何?’充对曰:‘《河图括地象》曰:‘有汉世礼乐文雅出。’《尚书璇玑铃》曰:‘有帝汉出,德洽作乐,名予。’”帝善之,下诏曰:‘今且改太乐官曰大予乐。’”礼乐制度的设立或改革,是王朝政治建设的大事。此事的重要意义是,它是依据图讖之说改革制度的重大政治实践,对后世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。而所依据的《河图括地象》、《尚书璇玑铃》,应当就在刘秀所宣布的图讖之中。明帝刘庄学通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,亦钟情图讖。永平十八年(75)十一月发生日食,有司上疏章帝,有“(明帝)聪明渊塞,著在图讖”之语(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)。其具体所指,李贤注已揭出:“《河图》曰:‘图出代,九天开明,受用嗣兴,十代以光。’又《括地象》曰:‘十代礼乐,文雅并出。’谓明帝也。”这可能正是明帝重视图讖并据以改革礼乐制度的深刻、隐秘的原因。也因此,明帝常常牵合经、讖。如《东观汉记》卷十一《樊准传》云:“孝明皇帝尤垂情古典,游意经艺,删定乖疑,稽合图讖。……亲自制作《五行章句》。每享射礼毕,正坐自讲^③。”明帝诏书亦往往“稽合图讖”^④,如永平八年十月发生日食,明帝下诏曰:“朕以无德,奉承大业,而下貶人怨,上动三光。日食之变,其灾尤大,《春秋》图讖所为至遣^⑤。永思厥咎,在予一人。”(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)明帝朝修订国家大典礼仪,也是经、讖互参,如《后汉书·樊儵传》载:“永平元年,(儵)拜长水校尉,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,以讖记正《五经》异说。”

刘秀、刘庄是东汉王朝最具影响力的君主,所谓“后之言事者,莫不先建武、永平之政”(《后汉书·明帝纪论》)。刘秀讲论经典乐而不疲,同时向天下颁布了图讖定本;刘庄“博贯六艺”而“稽合图讖”,示范经、讖牵合互释之思路。他们这种政治文化取向,必然对东汉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和规约。

(3)(建初四年十一月,章帝下诏“使诸儒共正经义”)将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、郎官及诸生、诸儒会白虎观,讲议《五经》同异,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,侍中淳于恭奏,帝亲称制临决,如孝宣甘

① 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:“肃宗立,降意儒术,特好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左氏传》。建初元年,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、南宫云台。帝善说,使发出《左氏传》大义长于二者。逵于是具条奏之曰……书奏,帝嘉之,赐布五百匹,衣一袭,令逵自选《公羊》严、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,教以《左氏》。……逵数为帝言《古文尚书》与经传《尔雅》诂训相应,诏令撰《欧阳》、《大小夏侯》、《尚书古文》同异。逵集为三卷,帝善之。复令撰齐、鲁、韩《诗》与《毛氏》异同。并作《周官解故》。……八年,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,受《左氏》、《穀梁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,由是四经遂行于世。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,朝夕受业黄门署,学者皆欣欣羡慕焉。”由此可见章帝于喜好图讖之同时,亦倾心扶助古学。

② 参见《后汉书》各自本传。又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论曰:“桓谭以不善讖流亡,郑兴以逊辞仅免,贾逵能附会文致,最差贵显。世主以此论学,悲矣哉!”

③ 《后汉书·桓郁传》:“(明)帝自制《五家要说章句》,令郁校定于宣明殿。”李贤注:“《华峤书》曰‘帝自制《五行章句》’,此言‘五家’,即谓五行之家也。……其冬,上亲于辟雍,自讲所制《五行章句》已,复令郁说一篇。”

④ 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四“汉帝多自作诏”条,云东汉光武、明帝、章帝多自作诏书。可参。

⑤ 李贤注:“《春秋感精符》曰:‘人主含天光,据阊阖,齐七政,操八极。’故君明圣,天(一作“人”)道得正,则日月光明,五星有度。日明则道正(道正,一作“政理”),不明则政乱,故常戒以自勗厉。日食皆象君之进退为盈缩。当春秋拨乱,日食三十六,故曰‘至遣’也。”

露石渠故事,作《白虎议奏》。(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)

根据章帝诏书,白虎观经学会议的缘起,是“中元元年诏书(按《光武帝纪》未载),《五经》章句烦多,议欲减省”之事一直未能实行,现在要完成“先帝大业”^①。其目的,是通过“讲议《五经》同异”,来统一经义、统一思想。如此看来,这是一次具有思想“战略意义”的严肃醇正的经学研讨会。关于此次会议的结集,相关文献中出现《白虎议奏》(见上)、《白虎通德论》^②、《白虎通义》^③三个不同名称。一般认为,《白虎议奏》是会议纪要,是原始记录;而《白虎通德论》、《白虎通义》是一种书,即《白虎通》,是思想统一之后的决议^④。那么,这份天下鸿儒参与讨论并经章帝亲临决议的经学纲领性文献,究竟是怎样的状貌呢?庄述祖《白虎通义考》言之甚精当:“《白虎通义》杂论经传……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六艺并录,傅以讖记,援纬证经。自光武以《赤伏符》即位,其后灵台郊祀,皆以讖决之,风尚所趋然也。故是书之论郊祀、社稷、灵台、明堂、封禅,悉隐括纬候,兼综图书,附世主之好。”^⑤“傅以讖记,援纬证经”,的确是其重要思想特征。白虎观会议及其思想成果《白虎通》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继承刘秀尤其是明帝以来经、讖牵合的思想取向之基础上,又进一步把经、讖牵合互释的思想原理及其系统的思想成果,以国家思想“法典”的形式固定下来,成为东汉王朝最崇高的统治思想。

关于刘秀、刘庄、刘烜持续的政治思想建构,以下两点尤须突出强调:

其一,如果说刘秀的颁布图讖,乃是凭借政权威势强行确立图讖崇高的政治思想地位,那么,明帝刘庄的“游意经艺,删定乖疑,稽合图讖”,则是在学理上通过经、讖牵合互释来巩固图讖的既定地位。刘庄较刘秀的高明之处也正在这里——在学理上进一步强化经、讖牵合互释之思想途径,既巩固了图讖的地位,也成为天下学者思想取向的有力指引(贾逵于明帝时上言《左传》与图讖相合者若干事,明帝“写藏秘馆”,即是显例)。到章帝刘烜再进一步,将经、讖结合的《白虎通》确立为国家政治伦理之“法典”,也使经、讖牵合互释成为了“法定”正统的思想途径。而经、讖牵合之滥觞,乃发自汉初,其后流衍未绝;唯东汉明、章二帝更张煌其事,赋予其神圣不可侵犯之思想地位。

其二,刘秀“宣布图讖于天下”,乃是以中央政令的形式颁布思想文化纲领,必然是审慎的。其称为“图讖”,而并未称“纬”。刘庄、刘烜的时代也只称“图讖”而不曾称“纬”。《白虎通》称引“《春秋讖》”、“《孝经讖》”、“《论语讖》”以及“讖曰”各一次;用“纬”字仅一次,见于《封禅》:“德至文表(当作“八表”),则景星见,五纬顺轨”^⑥,指五行星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虽没有像《隋志》、两《唐志》那样明确列出“讖纬”一类,但其《数术略》所录图书中,恐有与后世所谓讖纬难逃千丝万缕之联系者^⑦,而绝无“纬”或“讖纬”之称。据此种种情形,可以推断:东汉至章帝时期,尚无“纬”之名称。若再参考张衡《请禁绝图讖疏》只称“讖书”、“讖”、“图”、“图讖”而不称“纬”及“讖纬”的情形,则似至东汉中期仍无“纬”之名称。

结 语

本文穷蒐先秦两汉典籍及其他相关史料,并辅以必要的考辨,已大抵勾勒出汉代讖、纬分合演变

① 《后汉书·杨终传》:“终又言:‘宣帝征群儒,论定《五经》于石渠阁。方今天下少事,学者得成其业,而章句之徒,破坏大体。宜如石渠故事,永为后世则。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。”

② 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:“天子会诸儒讲论《五经》,作《白虎通德论》,令固撰集其事。”

③ 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:“建初中,大会诸儒于白虎观,考详同异,连月乃罢。肃宗亲临称制,如石渠故事,顾命史臣,著为通义。”李贤注:“即《白虎通义》是。”但此书通行的称呼是《白虎通》。正式的《白虎通义》之名,似是到唐代始见。如《旧唐书·礼仪志》中宗李显神龙元年太常博士张齐贤上疏称引“《白虎通义》”,《新唐书·黎干传》亦曾称引“《白虎通义》”。至史志目录,唯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称“班固等《白虎通义》六卷”,余则皆称“《白虎通》”。

④ 参见陈立:《白虎通疏证》附录庄述祖《白虎通义考》、刘师培《白虎通义源流考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4年。

⑤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云:“书中征引六经、传记而外,涉及纬、讖,乃东汉习尚使然。”

⑥ 《礼记注疏·礼运》孔颖达《正义》引《援神契》:“德至八极,则景星见。”

⑦ 如其“天文”类所著录的二十二种图书,明显可知其基本内容即为星占。其“五行”类、“杂占”类,以及《兵书略》中的“兵阴阳”类等,也大有类似今存之讖纬书者。

比较明晰的轨迹。今将主要观点总结于次：

就事实而言，讖验（征验）的行事和观念，自春秋至汉末从无间断。其具体表现，如以今天所见之讖纬书的主要内容来衡量，则所谓“天文占”、“五行占”、“史事讖”等等，春秋以来一直都持续不断。刘汉四百年之中，亦是如此。惟入汉之初，儒学复兴而终于独尊。因而以讖“纬”经之事，便伴随经学兴起而出现，至东汉初年大盛，终至登堂入室，经、讖牵合互释的思想（及思想方法）取得正统而崇高之地位。就名称而言，“讖”之称始见西汉初年，“纬”之称始见东汉后期，“讖纬”之称始见汉末魏初。

以上为两汉讖、纬名实之大势。然讖、纬名实之间的分合纠结，以及密切相关的讖纬起源问题，犹有当分说者：

其一，对讖而言，乃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。讖验之事实自春秋以来一直存在，而“讖”名迟滞，到西汉初年始见，而名实相合。

其二，对纬而言，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。东汉后期称为“纬书”者，其实并不存在。“纬”的本义是“反复围绕以成经”，从言说（著述）的意义而言，“纬”是指对经典的阐释活动，而并非一种文类书体。注释、解说甚或醇正地发挥经典的著作，本称之为“传”（如《毛诗故训传》、《春秋》三传、《尚书大传》等），而不称“纬”。然则东汉后期何以出现“纬书”之称？根据本文考述，西汉初年伴随着儒家经典的逐步确立，随即出现了以讖“纬”经的学术思想实践，两汉四百年一直不曾间断。在长期的以讖“纬”经实践下，尤其在东汉初年三代帝王的强势引导下，以讖“纬”经已经成为官方正统的思想方式和话语方式。为了高尚以讖“纬”经之事，遂将以讖“纬”经的思想成果即称为“纬”，以与“经”相对并峙——这应该也是比较合理的解释。因此，所谓“纬书”者，必当以经、讖牵合互释并且在思想理念上偏重于讖为其特征。这样的东西，实质上就是讖书^①，径称之为“讖”可也。它与依托于经的醇正的“传”（如《毛诗故训传》、《春秋》三传、《尚书大传》、《春秋繁露》等）是很不相同的。

其三，至于“讖纬”之称，可能正是鉴于“纬”之远离“传”而偏向“讖”（以讖“纬”经）的实际，而发明的一个更加能够显示所谓“纬书”实质又不失尊贵的名称，故比较后起。

其四，以讖“纬”经，是辨识两汉讖纬的根本标志；单纯的讖验故事不是讖纬。因此有汉之前不得有讖纬；魏晋之后，如只是讖验占测而与经学无关，亦不得目为讖纬。在两汉，以讖“纬”经的实践，乃始于文帝时期，彼时便是讖纬的源头。因此，历来通行的“讖纬始自哀、平之际”的说法，不仅曲解了张衡（见文首），也与西汉的思想发展实际不符，是不准确的。

总而言之，据史实看来，“讖”、“图讖”一类东西，自春秋至汉末魏初一直是存在的，其基本性质在各个时代并无实质的差别；只不过到汉代以后与儒经牵合互释，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而已。而所谓“纬书”，事实上并不存在。东汉后期称为“纬”或“纬书”的东西，实质上就是以讖“纬”经的讖书；尊称为“纬”，乃自我高尚耳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，讖、纬之名实纠结复杂，唐代以来“讖纬有别”和“讖纬无别”两种观点，都失于粗陋，缺乏历史的翔实考梳。

[责任编辑 刘培]

① 本文“纬即讖”之判断，结论虽与主张“讖纬一也”的学者貌似相同，但内在思理绝然相异。慧心自明。